

# 此地春秋宜细览

□石一宁

晨阳灿灿,秋风缕缕。  
寿县古城墙东门,如今是寿县县城人的一个出行通道,行人与摩托车来来往往,冒着一股股现代生活气息,然而走进门来,仍觉古远的历史尘烟亦同时扑面而来。这座始建于宋、多次修葺和完善于明清、周长为7000多米的古城墙,是中国保存较完善的七大古城墙之一。古城墙体以土夯筑,外侧贴砖,内壁则砌以石块。东门内只见块块墙石已凹凹凸凸、斑驳陆离,无声地展陈着近千年的风流云变。北壁一块长方形条石上刻着的一幅画让人不禁驻足凝视:一条卷成两圈的长蛇张开大口扑向一个高冠长服的人。原来,画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掌故,据说此语便起源于寿县,且“象”实为“相”。掌故里的蛇原为一蟒蛇精,因犯天规被玉皇大帝命雷公轰出原形,化作小蛇蜷缩于野。寿州(寿县古称之一)秀才梅生郊游发现小蛇,救起并养大。皇太后身患沉疴,榜征良医并许以高官。已长成巨蟒的小蛇告曰从其腹中割下一块心肝,即可治愈皇太后。梅生如言割蟒心肝献贡,获封宰相。梅生衣锦还乡祭祖,寻思再割蟒蛇一块心肝永保长生。蟒蛇应允,梅生钻进蟒腹,竟起意割下全部心肝,大蟒剧痛难忍,大口一合,梅生葬身蟒腹。这一掌故对我原有的认知是颠覆性的:原来“人心不足蛇吞象”不是讽刺蛇吞大象,而是讥讽人之为蛇所吞也。

东门里还有一石刻,蚀化较厉害,但仍可看出刻的是一鸡一凤。这是“凤凰落毛不如鸡”的图写。此与寿县何干?按寿县说法,画的是战国时赵国良将廉颇的故事。赵孝成王赵丹即位后,中秦国反间计,以夸夸其谈的赵括为将取代廉颇。秦军在秦将白起的率领下射杀赵括,四十万赵军投降后悉被坑杀。几年后,燕国举兵击赵,廉颇复用,大破燕军,乘胜包围燕国,逼得燕王割五城求和,廉颇获封信平君,为假相国。廉颇当初从长平免职回家时曾“故客尽去”,深深尝过“凤凰落毛不如鸡”的人情凉薄。此番再起,客又纷纷登门。廉颇不耐烦而逐客,客反惊讶廉颇见识何其迟钝,振振有词说:“夫天下以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赵丹死,其子悼襄王赵偃继位,又以乐乘取代廉颇,廉颇大怒之下打跑乐乘后投奔魏国。魏国不用廉颇,屡被秦兵围困的赵偃则想再起用廉颇,其仇人相国郭开贿赂被派去考察的使者。廉颇尽管在赵国来人面前展现一饭斗米、肉十斤和披甲上马的身体状态,仍落得考察报告的一剑封喉:“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楚王暗地里派人迎请廉颇,但廉颇为楚将期间并无立功,最终郁郁死于楚都寿春(亦寿县古称之一),其墓在距寿县县城7.5公里的八公乡郝圩村。无论在魏在楚,晚年廉颇的身影皆差可以“凤凰落毛不如鸡”一语写照,石刻亦透现寿县人对廉颇晚年处境之共情。

寿县古城墙东门又称宾阳门,在朝阳升起的东方高迎贵宾,当是中国古代的待客之道。门楼上高悬书有“宾阳楼”三字的楼匾,登楼远望,但见天色湛蓝,万里无云,远处八公山如卧如伏,如

屏如障。城墙外是连接淝水的护城壕,秋阳下,碧水粼粼,白光片片,近岸水面则分着水藻和灌木,有小船作业其中。如此和平光景,令人难以想象,公元383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淝水之战,即发生于此地。

寿县古称寿州、寿春,淝水之战时,因避东晋后郑阿春讳,寿春已改称寿阳。战斗间隙,苻坚与其弟阳平公苻融曾登阳城侯望晋军,不知两人当年所登之寿阳城,其位置是否即现在的寿县古城?在宾阳楼上俯瞰淝水之战古战场,我陷入了沉思。关于一千六百四十余年前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的意义,一种观点认为它巩固了东晋在江南地区的统治地位,使得汉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然而纵观这一时期的东晋王朝,英伟卓越、领袖群伦者其实付之阙如。皇帝司马曜是个傀儡,把持军政大权的谢安及其家族,亦是苟安度日而已。一些史籍津津乐道谢安与客人下围棋,接报淝水之战大捷的消息,了无喜色,下棋如故。客人问起,谢安慢吞吞说:“小儿辈遂已破贼。”这一故事恐怕更是刻画了谢安故作矜持、过于做作的为人。故事的后一段,谢安下完棋走进内室,“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过门槛时所穿木屐后跟被绊折了(可能摔了一跤),谢安最终还是把持不住内心的激动。然淝水之战的胜利,也只不过延长了东晋王朝三十七年的寿命。

淝水之战失败一方的前秦君主苻坚,却是一个更有故事的人物。苻坚为东海王时,前秦皇帝、苻坚的堂兄苻生为人变态残暴,并欲除掉苻坚及其兄清河王苻法。被逼无奈的苻坚兄弟遂合力将苻生先废黜后杀掉,兄弟两人一番互相谦让后,苻坚乃去皇帝之号,称大秦天王。苻坚“举异才,修废职,课农桑,恤困穷,礼百神,立学校,旌节义,继绝世,秦民大悦”。在选才求贤方面,命各地官员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经过考察,真是贤才者奖赏,非者问罪。由此官员不敢随便举荐,请托之风被迫止,士人皆靠自己努力,宗室外戚,无才能者也都任用。“当是之时,内外之官,率皆称职;田畴辟,仓库充实,盗贼屏息。”前秦是民族建立的政权,苻坚却颇有各民族一视同仁的胸襟气魄,他对汉族丞相王猛无比信任,说自己和王猛义则君臣,亲逾骨肉,比齐桓公之与管仲、燕昭王之与乐毅、刘备之与孔明,自觉已经超过。前秦鲜卑族宗室慕容垂前来投奔,被授予冠军将军;羌族降将姚萇,被封为龙骧将军。前秦在苻坚的治理下,苗壮成长为公元4世纪70年代与东晋比肩的重要政权之一。国兴民强,因此不难理解苻坚起兵南下、一统中国的雄心壮志。然而淝水战败,前秦逐渐分崩离析,慕容垂、姚萇皆反叛,苻坚最终被姚萇所杀。

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的原因,前人多有分析。有意思的是,论者的身份不同,结论亦大异其趣。唐代司空图《与孙处士书》虽称苻坚“雅量瑰姿,变夷如夏”,但亦斥其“轻敌怒邻,穷兵黩武”,最后落得“宗社迁于他族,身首罄于贼臣,貽戒将来,取笑天下,岂不哀哉!岂不谬哉”。明太祖朱元璋在将后赵开国皇帝石勒与苻



寿县古城墙今貌

坚相比较时,认为苻坚“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屠人无数的朱元璋显然觉得下狠手杀人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宋代政治家兼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光则认为如果苻坚治国不失其道,那么慕容垂、姚萇都是前秦的能臣,岂能作乱。苻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多次得胜而生骄傲轻敌之心。当代作家柏杨亦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苻坚是一个胸襟开阔、从不猜忌人的人。这种高贵的情操必然产生一种观念,认为只要诚心待人,对方一定诚心待我。所以他对那些投降或被俘的帝王将相,从不杀戮……苻坚的错误并不在此”。苻坚败亡的原因,是他实施的一项重大决策,即把祖居关中的氏族,分批前往全国各地驻防,同时又把前燕旧地的鲜卑人大量移入关中。这种以氏族作为安定力量控制全国各重要据点并同化鲜卑人和羌人的构想虽然正确,却需要以中央政府力量强大为前提,而民族同化也至少需要五十至一百年的时间。

当此之时,流连于寿县古城墙上,只见天朗气清,丽日映照秋色,似乎昭示着前尘旧事俱往矣,是非成败转头空,然我心中意犹难平。苻坚确实是败了,而且败得很难看。淝水之战中八十七万大军足以“投鞭断流”,然而对八万五千人的晋兵,终究不堪一击,落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悲哀下场。自此一步错步步错,前秦走向土崩瓦解,运消国除。如果在战争前缺少战略远见,在战争中战术不过硬,人数再多亦不过乌合之众而已。国更强、民更富,实现真正的民族融合,才是奠定中国统一的牢固基石。苻坚留给后人留下的遗产,更多的是历史的深刻教训。

来到寿县,听到寿县朋友多次提及,寿县乃

西汉淮南王国国都,是淮南王刘安出生和死去之地,也是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的成书之地。寿县城北,八公山东,四顶山南,有山名曰五株山,山的南坡即为刘安墓。在午后斜阳的微晒下,我和同来的一行人沿台阶而上,在一块圆顶墓碑前止步端详。碑上楷书“汉淮南王墓”为安徽布政使、署巡抚吴坤修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所撰。1986年,当地政府拨款按原墓形重修的刘安墓,呈“覆斗式”,占地2366平方米,环墓筑有1米高的青石护土墙,迎面镶嵌石刻保护标志、重修墓碑和管理规定,古气肃穆中夹杂现代世俗元素。

树木森森,茂草青青。“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静立刘安墓前,一边凭吊,一边回忆楚辞诗篇《招隐士》。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题该诗作者为刘安,其他书籍多标注作者为刘安的宾客淮南小山。在汉代诸多亲王中,刘安尤特出。刘安对寿县的一大贡献,是他作为中国豆腐创始人使寿县成为豆腐的发祥地。刘安又被称作西汉文学家、道家、思想家,20多种主要著作涉及哲学、文学、音乐、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流传至今的,主要是《淮南子》。

刘安一家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父亲刘长是刘邦之子,刘长在世时,封刘长为淮南王。汉文帝刘恒即位,刘长因谋反被废王号,在被遣往蜀郡严道县邛崃山邮途中不堪忍受折磨,绝食而死。刘恒三分淮南国给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史籍说,刘安心中怨恨父亲刘长之死,时常想叛变,因此长期做准备。谋反事发,汉武帝刘彻派宗正手持符节去审判刘安,刘安闻风自刎而死。王后荼、太子刘迁和所有参与者皆被灭族。之后,已

徙为衡山王的刘赐结局亦类似。

阅读《淮南子》,每每为其百科全书式的博大思维和天才般的智慧而惊叹。“羌、氏、樊、翟,婴儿生皆同声,及其长也,虽重象、狄、豨,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则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观之,衣服礼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在两一千多年前的西汉那个时代,刘安和他的同道们即认识到各民族的差异不是内在人性的不同,而是外在教化熏陶的结果。“前有轩冕之赏,不可以无功取也;后有斧钺之禁,不可以无罪蒙也。素修正者,弗离道也。”“情胜欲者昌,欲胜情者亡。”“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稊生于弗耨。圣人为善若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难以想象这些睿智的思想,与“谋逆”者刘安的形象能重合。是人格分裂,抑或冤假错案?现代学者金相香即认为,《招隐士》一首,“详其词意,当是武帝猜忌骨肉,适淮南王安入朝,小山之徒知谗衅已深,祸变将及,乃作此以劝王亟谋返国之作。”当代学者詹安泰、荣庚、吴重翰合编的《中国文学史》亦说:“《招隐士》的写法,全用比喻。描写山中景物,惊心动魄,象征着刘彻王朝一切险恶残酷的现象,从而暴露刘氏宗室互相残害的那种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矛盾。”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司马迁说:“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携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然而,以往读《史记》和相关史籍中的刘安传略,此刻徘徊于刘安墓前,我皆不知有何好笑,笑从何来,而是结实实地感受着历史如大山一般的沉重。

寿县历史上四次为都,十次为郡,乃楚文化之故乡,堪称轰轰烈烈。几多传奇,热血春秋,宜细细看。

## ■作家书房

# 我与书房

□宋曙光

都被编辑工作占去,偶有写作灵感,身边有一支笔和一张纸就够了。我的两本诗集,都是利用零碎时间写成的。那时,每当送女儿上家教,那短暂的一两个小时,就是我的创作时间。老师如在大礼堂授课,外面的楼道就是书房;老师如在有庭院的教室里讲课,我就坐在树荫下构思,身边吹夏风,头上飞蚊虫;爱人住医院做手术,陪伴的病房又变成临时书房,看报纸副刊的大样和小样,医护人员频繁进出,耳边全是对生命的渴盼……

做报纸副刊编辑几十年,对读书、写作是有计划的。中国古典名著、外国名家译作,都想要购买齐全,形成规模。而写作,尽管自己有规划,却不是坐在书房里就可以实现的。我的许多诗歌作品,多数是在出访、行进之中成篇。例如,在山区老乡家的土炕上,我写过乡土诗;在赴京约稿的列车上,写过青春诗;在汶川地震的废墟旁,写过抗震诗;在漓江边的阳亭下,写过山水诗;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写过白云诗……

可见,我对书房的定义是宽泛的,理解是随缘的,不必苛求。书房的作用无非一是便于读书,二是用于写作。我曾采访过一位老油画家,他的画室里有一个特制的木架子,作画时,他要手托油彩盘爬上爬下,画室内的光线必须充足,还要有偌大的画案,配备笔墨等所需画具。书房虽不需与画室相比,但我认可书房有存身之所,人有写作之地,就可以称作书房。

我不羡慕那种有着整面墙都是图书的书房,爱书的、写书的、藏书的,都希望能有一间像样的存书之所,普通人有时连住宿都成问题,哪还敢奢想什么书房?写书之人成名后,大抵是可以布

置一间书房了;而藏书家的标准就是要有一定数量的藏书,豁出去自己住处逼仄,也要把书籍安顿好。至于爱书之人,无节制地买书、存书,有时还会造成家庭矛盾。倒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办公室相对宽绰,可以用来存放书籍,减缓了自家住房的压力。

我工作时,就是将书房分作两部分:家里和办公室。新书尽量不往家里拿,办公室便成了存书之地。每天八小时工作全在单位,办公室的两个书柜,日积月累地很快就装满了,再有书就只能放到窗台、堆放在地上,最终便形成了包围圈。我的办公桌对着一面墙,身后是一溜书,堆靠在一位编辑的桌子下边,右手就是窗台,摞起的书已漫过半截窗户了,只余左边被书挤出的一条窄道,进进出出都得小心碰响。

当我有了行政职务,可以搬到部主任办公室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原因之一,是我“搬不动”这些书,我对它们有了情感,愿意守着它们,身在书堆中工作已成为习惯,适应了。偶有作者到编辑部来,进门便惊讶地说,这不就是《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场景吗?不错,这就是编辑部——真实的报纸副刊编辑部。

因工作之需,书的数量不断增多,不是日进斗金,而是日进斗“书”。到我退休时,办公室里的书已多得不行,该怎么处置?我不可能全都搬回家去,这些书我不想卖,也不能卖,价格就像卖废纸,舍不得。可不卖又没人要,东联系、西联系,报社附近有一家文化单位,但他们也不愿意接收,说是没处放。

我开始发愁,这些书该怎么办?一位老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他退休后,费了很大精力处理旧

书:分别从三个处所分批处置,一次比一次彻底,只将极少数必备之书带在身边,其余的都“忍痛”舍弃了。我当时听了并没往心里去,可是不久,随着相熟的几位老作家去世,他们的书籍和文稿等,几乎成了“废品”,子女们毫无兴趣继承父辈的书籍,这样的结局使我震撼,对书的命运心生悲悯。

我对书是有感情的,年轻时尤其热情高涨,喜欢收存一些心仪的图书,但真正用到它们的时候却又很少,有些书时间一长连自己都忘记了。家里原有的存书,加上从单位带回来的书又摞成书山,每到新年不得不一次次地做减法。此时,想起那位老朋友对我说过的话,不禁有了同感。我心目中的书房,不在高大,不慕时尚,却是要照进阳光的,充裕的光线能够照亮书上的文字,让眼睛感到舒适。书房的阳光可以点亮心灯,心里有了光,眼前就豁亮,脚下的路就宽敞。其实,读书人能有一隅之地就足够了,譬如在灯下,床头台灯的一圈光晕,宿舍上下铺的被窝里那一束手电筒的微光……

我退休后仅一年多,为了媒体融合,报社又将动迁。那天,在将报纸副刊订本封箱寄存时,我对年轻的同事说,这些报刊资料一定要保存好,毁掉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这个办公室,今后也是回不来了,新的编辑部不会复原这样的办公环境,还是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吧。随着手机的几次晃动,这个见证了我们辛勤耕耘过的副刊编辑部,从此便永远留在了记忆里。

至此,我对书与书房的解读,由繁到简:在劳作之后、闲暇之余,能够有一个安心之处,坐下来看几页书、写上若干文字,那就是莫大的幸福。

说起来,我是在参加工作之后,有了报纸和杂志,有了书籍,需要有一个存放的地方,才逐渐萌生了对书房的向往。而且,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所需,确实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书房了。可是,居住条件不允许,那一时期,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相关条例都向着困难职工倾斜,先保证居住,而后才是改善条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报社编辑部没有专用书柜。我的办公用书,仅是一本新华字典,桌子上除了稿件,还是稿件,个人购书都要拿回家去,这种情况维持了很久,对于书房也就向往了很久。

我在外出约稿时,到过很多作家、诗人的家,天津及外省市的都有,他们的住房都很温馨,却没见过多么讲究、豪华的书房,他们的写作大都是有一张能写字的书桌就够了。在孙犁



报社搬迁前的副刊编辑部办公室(宋曙光摄)